



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3)

陈平

2010-2-26 13:44:46

来源：《红旗文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学与历史学难题

不但西方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传统的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也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谜团重重。西方左翼思想家难以理解为何发达国家的工会目前成为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西方政治学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奇怪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打破了这些传统的思维。几个事实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思想影响下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之一。不但中国革命依靠农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民的教育普及率远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上，给农民工进城奠定了基础。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中国国企的改革，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独大局面。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廉价社会保障的基础。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但可以养活中国人口，还有出口竞争力。看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离开农村的发展就是空话。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走出了西方大农场以外的新路。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新经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认为穷国多的是劳力，缺的是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储蓄率和投资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发展中的中国竟然资本输出到最富强的美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技术进步率，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说到底，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大幅降低创业风险，大幅提高资本收益率。这是传统资本理论没有预见到的中国创新。

第三，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开放外资，而且是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400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为此占领非洲、美洲、澳洲的大片领土，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30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胜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我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

第四，中国的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发展中国

家科技进步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常规，表明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教育传统深入人心，比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还能适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再穷的农民家庭，一旦进城打工获得收入，首先投入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敢于和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温州商人和福建农民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超过西方殖民主义在炮舰政策支持下的扩张能力。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面对西方的反华浪潮，中国留学海外的学子与旅居海外的华人表现出举世震惊的团结。中国2000年的统一历史造成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超出西方媒体的想象，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民主意识等西方概念的局限。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来投资的整合能力，超越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四川汶川地震中，中国军队、企业界、民间团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调能力，给世界全新的印象。

人们要问，中国崛起是否能超越日本与东亚模式的局限，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思路？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问题。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